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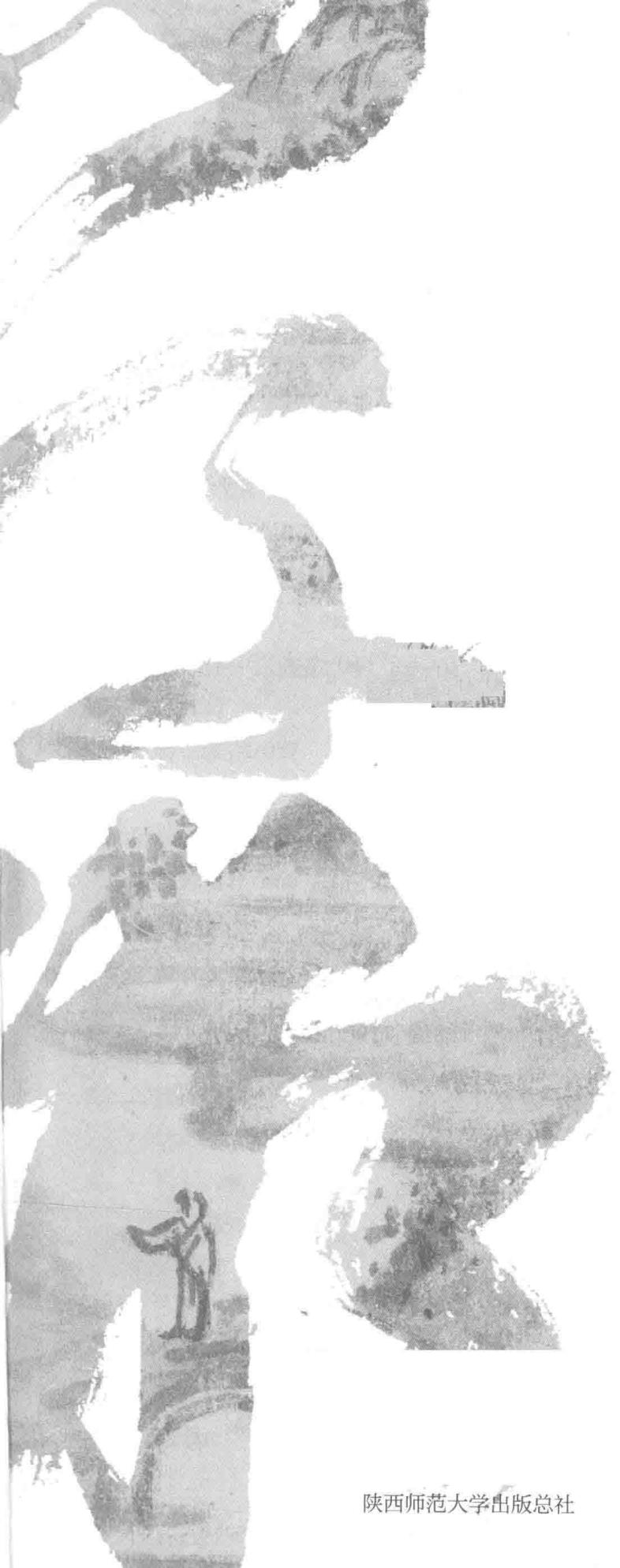
霍松林

学术随笔集

霍松林

著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霍松林 学术随笔集

霍松林 著

图书代号 SK18N01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霍松林学术随笔集 / 霍松林著. — 西安 : 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1

ISBN 978-7-5613-9788-6

I . ①霍 … II . ①霍 … III . ①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020347号

霍松林学术随笔集

HUO SONGLIN XUESHU SUIBI JI

霍松林 著

责任编辑 王晓飞 杨杰

责任校对 庄婧卿

出版发行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 <http://www.snupg.com>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mm × 1030mm 1/16

印 张 19.25

插 页 4

字 数 423千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13-9788-6

定 价 160.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刷装订问题, 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 (029) 85303879

目 录

伤逝忆旧

- 序《书联集锦》忆右翁/002
缅怀邓宝珊先生/008
怀念匪石师/012
怀念辟疆师/026
忆于右任先生在广州/033
《太华图》及诸名家题咏/037
忆王达津、胡念贻先生/042
我所了解的徐中玉先生/044
花甲忆往/047
缅怀往昔话读书/057

萍踪剪影

- 终生难忘是童年/066
佛殿书声/068
柏溪留影/070
游学金陵/073
讲学南泉/076
故里授徒/079
从头学起/082
难忘一九五六年/083
一览小群山/086
浙江记游/088
畅游山西/091
从兰州到敦煌/094
观沧海/097
东渡讲学/099

难忘松本遇知音/102

京都盛会说唐诗/104

北山纪游/107

长安诗话

古代长安歌谣/110

王粲的《七哀》第一首/113

《长安道》和《长安有狭斜行》/115

杜甫的《夏日李公见访》/118

南山诗/120

枣树的赞歌

——说白居易《杏园中枣树》/123

旱灾诗与抗旱诗/125

关于《柏梁台诗》/128

马总赠日僧空海“离合诗”/132

王绩在长安所作问答体诗/136

阅世随笔

谈虎/140

谈蚁/151

华山抒感/156

清明时节话清明/160

鸡年抒情/163

马嵬诗漫话/164

诗艺杂谈

人为什么要作诗/176

诗用数词的艺术特点/179

卢仝的《有所思》与贺铸的《小梅花》/182

谈杜甫《秦州杂诗》的格律特点/186

陈元方的诗改理论与实践/188

律诗及其“改革”/192

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198
中华诗歌中的喜剧意识/202
关于古典诗歌的今译/205
关于“艳体诗”/207
诗的创新与用韵/209

治学刍言

我的师承关系/214
关于练基本功/218
治学经历和感想/224
“断代”的研究内容与非“断代”的研究方法/231
漫谈自学/235

课余随笔

于右任先生嘱集对联/240
辟疆师见示近作/241
辟疆师与李拔可先生论诗/242
夏剑丞先生《题太华图赠右老》/243
辟疆师论治目录学/244
名词动用举例/247
仲长统论贪污之故/248
李、杜诗中之石门/249
老杜状月诗/250
老杜当时无篇什者往往补写于异日/251
丁棱“棱等登”/252
郭祥伯论唐文/253
后山不背知己/255
后山送内/256
后山《寄外舅郭大夫》/257
后山七律压卷/258
戴复古诗有家学/259
方回论律诗变体/260

元好问论诗重阳刚之美	/261
元好问论文	/262
中州豪杰李屏山	/263
屏山、遗山论诗	/265
鵠林墨迹	/266
殷岳、张盖	/267
卢世㴋《杜诗胥钞》	/268
杜甫与杜五郎	/270
清初江左三大家	/271
钱牧斋其人其诗	/272
牧斋诗论诗风	/273
梅村诗有寄托	/275
梅村五古时得杜韩之胜	/277
芝麓学杜未化	/278
愚山、渔洋诗论诗格之异	/280
陈其年词以壮语见长	/282
朱竹垞词	/283
笠翁论剧特重新调	/284
袁枚论善学古人、求变求新	/285
好意翻新	/286
“温柔敦厚”与“兴观群怨”	/287
五七言诗难易及“一三五不论”之谬	/288
高密诗派与《二客吟》	/289
全祖望以乡邦故实名集	/290
黄仲则太白楼赋诗	/291
黄仲则七古	/292
宋芷湾论文	/294
清明诗数例	/295
惕轩诗文	/296
鸡鸣寺题壁诗	/297
慈爱园	/298
诗词每句用同一字	/300

伤逝忆旧

序《书联集锦》忆右翁

乙酉初夏，雨过天晴，我正在窗前伏案写作，忽然门铃轻响，于媛女士推门而入，将一大摞书稿放在我眼前说：“这是我编辑的《于右任书联集锦》，请霍老题签作序。”我请她在对面沙发上坐下，然后逐页欣赏，始而凝视，继而惊喜，兴奋地说：“书编得很好！第一，入选的大多数是于书楹联，规模之大，选择之精，都值得重视；第二，其中不少作品，大陆已有的出版物中似乎还未出现，足以开拓眼界，引人入胜。这是您经过长期努力才汇集选编的，您一定有许多话要说。因此，这篇序，还是由您执笔、署名最合适；至于我，能有题签的机遇，已经深感荣幸了。”

于媛说：“霍老既然认为这部书有新特点，那么这篇序也应该不落常套。我认真想过，您在青年时期曾和于老交往数年，于老称您为‘文字交’或‘忘年友’。您在序中谈谈和于老交往时的见闻和感受，便可从一个新的视角彰显于老的人品、诗品和书品，使读者在了解掌故的盎然兴味中深受启迪，岂不比空发议论强得多！”

我由衷地称赞道：“这是绝妙的‘创意’！”便欣然赞同。

年华易逝，如今我已是 85 岁的老人。抚今追昔，感慨万千。那是 1947 年的春天，我正在南京中央大学中文系读三年级，曾在《中央日报》《和平日报》和《人文》等刊物上发表了不少诗词、随笔和学术论文，受到老师的赞许。于老长监察院，聘请了许多著名学者任监察委员，其中就有我的老师汪辟疆教授和卢冀野教授。他们在监察院开会休息时聊天，夸奖我这个来自西北的学生功底扎实，才华出众。于老听了很高兴，说他在报纸上也注意到署名霍松林的诗文，接着大发议论：“我们西北在周秦汉唐时很出人才，宋代以后经济南移，西北落后了，现在是江浙财团的天下，但西北还是有人才的，大家讲的霍松林，不就是难得的人才吗？”汪老师抓住时机，对于老讲：“这个学生家境清贫，学费困难，希望介绍个业余工作。”于老说：“做工影响学业，叫他来见我，我供学

费。”汪老师回校后把这一切告诉我，要我拿上论文剪报和手抄诗词去拜见于老。我第一次到宁夏路一号拜谒于老的情景和他对我的谆谆教诲，在我的有关诗文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专访中都有记述，这里不必详谈。这一次和此后多次拜谒，在谈话结束时都用宣纸写一张条子，让我到财务室去从他的工资中领一笔钱。这种条子，先后写过十多张，后来有人说：“你把那些条子珍藏起来，就更有价值。”这一点，我当时就意识到，但我实在太需要学费啊！

于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一贯缺钱用，却从微薄的工资中抽出一部分给我作学费，充分体现了他为国育才，“为万世开太平”的博大胸怀。1948年春，于老奉命参加“副总统”竞选，友人善意劝阻，问他“拿什么与人家争”。他笑着说：“条子！”友人大惊：“你还有条子？”他又笑着说：“有啊！乃手书‘为万世开太平’的纸条子，非金条子也。”于老短时期内日夜挥毫，遍赠“国大代表”，我曾为他拉纸。每一条幅写的都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大家都知道：这是北宋“关学”大师张载的名言，于老奉为座右铭而付诸实践，成为他平生事业和人格的写照。他用这种“条子”赠人，不是争名利争地位，而是争更多的人“为万世开太平”。于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他是多么向往太平世界啊！

我大学一毕业，于老就要我到监察院当科员，实际上是给他做秘书。1949年5月初，监察院迁广州，于老暂寓贝通津50号，心绪不宁，每逢星期天，我和冯国璘都去看望他。七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上午，我们又去了，副官让我们坐在书房里，便上楼去通报。紧接着，于老只穿白府绸中式裤子下楼来，对我们说：“广州太阳晒人，月亮也晒人，一夜没睡好。”书房不小，南北靠墙都是沙发，却没有任何降温设备。南窗外有一株大榕树遮住阳光，于老便和我们坐在靠南窗的沙发上聊起来。我照例呈上诗词新作请教，他赞许了几句，即从书案上找来他的新作，其中一首是《题李啸风〈劫余剩稿〉》：

大器方能开世运，至人始信出民间。

乾坤振荡风和雨，太息关中两少年。

于老先读了一遍，然后就第二句发挥：“来自民间的人了解民间疾苦，多能忧国忧民，凡事从国计民生着想。贫富悬殊太大，富者田连阡陌，贫者地无立锥，天下怎能太平？你们年轻，不知道我的经历和主张。我不反对共产主义，

只是考虑怎样才能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往圣昔贤，可以说都有‘共产’思想。”他指着我说：“你作诗学杜甫，杜诗读得很熟吧！试想当杜甫在《咏怀五百字》中写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时，难道不想‘共产’吗？我所说的‘共产’，指的是全民皆富，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当然，不可能大家都一样富，孟子就讲过‘物之不齐，物之情也’的话，但贫富太悬殊，以致出现了富家酒肉臭，贫家饥寒交迫的普遍现象，天下必然大乱，哪有‘太平’可言呢？……”于老的这些话，显然是有感而发的，而他心系民瘼的“布衣精神”和“为万世开太平”的执着追求，的确引人深思，发人深省。

1949年8月中旬，监察院部分人员向重庆疏散，我和冯国璘接到13日飞渝的通知，12日晚同往于老住宅辞行。于老正在开会。听说我们告别，立即离开会场，拉着我们的手说：“我很想留你们在身边，但时局如此，不敢留，你们就去吧！以后有机会，再叫你们来。”语调、神情，感人肺腑，我们鞠躬、转身之时，不禁热泪盈眶。到重庆后，我在南京中大的词学老师陈匪石先生刚应聘任南林学院中文系主任，约我去教书，久住南温泉。11月27日晚，忽然接到冯国璘于先一天寄出的信，信中说于老突然从香港飞到重庆，要我立刻去见他。当时班车已停，中间又隔着一条长江，当我赶到监察院时，于老已于28日上午飞走了，国璘也乘汽车赴成都转台湾。过了一天，重庆便迎来了解放。这里需要补叙的是：近一月来，于老一直住在香港，重庆监察院的陕甘同乡估计他会飞北平，也渴望他飞北平，谁也想不到他会突飞重庆。后来得知，当时蒋介石正在重庆，于老到重庆后又要求蒋介石送他到香港治病，蒋答应派专机送他，但那架专机却把他送到台湾去了。于老为什么突然飞重庆，多年来在我脑海中是个测不透的谜。1996年初春我应邀赴澳门讲学，承梁披云老先生设宴洗尘，畅叙今昔。梁老是于老于1922—1925年任上海大学校长时的学生，长期在南洋办教育，门人踞要位者甚众；现任澳门归侨总会主席及华侨大学董事长。由于我们都和于老关系极深，所以酒席间的话题主要围绕于老。他说：1949年冬于老在香港，不想去台湾，他和另外几个于老的学生要求陪于老到南洋去，于老很赞同；但当他听说有便机飞重庆时，立刻登机而去，目的是想救出杨虎城，却不知杨虎城已经遇害了！我听后才恍然大悟，于老的高大形象又一次在我眼前闪现，发出万丈光芒。于老与杨虎城将军在推翻满清专制、重建靖国军反对北洋军阀、坚守西安和解围西安等共同战斗中凝结的革命情谊谱写了壮丽的乐章，长时期响彻天际；而当他被迫去台之前，又为这壮丽的乐章谱写了悲

壮的尾声。

随于老去台湾的冯国璘，是我的同乡、同学兼好友，能文能诗，写得一笔好字。他的长兄国瑞先生曾是清华研究院的高材生，深受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诸大师器重，精于诗文书法和考古，曾替于老考订“鸳鸯七志斋”碑，所以国璘刚从中央大学毕业，于老就任他当秘书，十分信赖。去台湾后，又升为主秘和参事，一直追随于老。因此，通过冯国璘，是最能了解于老在台湾的真情实况的。然而两岸长期隔绝，直到 1990 年初才收到他的特快专递，其中有长信，有于老的照片和墨宝。信中说：“于老在世时，每年都有好几次问到你。1959 年 4 月 11 日过 80 寿，又问‘那个霍松林有无消息？他可是我们西北少见的青年啊！’”信中又说：“于老 80 华诞时身体还很健旺，形象独特，寿眉银髯，远望如神仙中人。当时此地摄影名家云集，争相拍照，其中以春秋所摄一帧最得于老喜爱，加印若干份赠亲友，又题赠吾兄一帧，嘱弟俟机转交。”又说：“于老公余有兴趣，便提笔写旧作给我，已保存 20 余年矣，随像寄上两片留作纪念。此种写法甚少有人看到，有暇可题诗寄我。”信中说他患了癌症，在家疗养，但不断有信寄来，又为我在台北出版了《唐音阁诗词集》，还由他出资、由我联系，找到了抗战时期于老为天水麦积石窟撰书的巨幅对联，刻石立碑。到了 1993 年 5 月，他自知来日无多，便由夫人照料来西安，一则看望我，二则把于老自撰自书的《〈呻吟语〉序》长卷交我珍藏。他来我家，我去古都饭店，多次畅谈往事，至今难忘。这里要特别叙述的是他半开玩笑地说：“看你住的房子，比我想像中的要好得多，不过比起我的来，还是有差距。我在台湾不算富，但一直很满足，不想发财。不瞒你说，我是有发大财的机会的，1960 年前后，多次有海外华侨汇巨款赠送于老，每次汇款来，我都立刻去报告，于老总是说：‘转给大陆救灾委员会！’连钱数都不问。我如果扣下一两笔，不就发大财了吗？但我没有扣。”这一席话，国璘似乎是表白自己的廉洁，而我想到的，则是一代伟人的胸襟。我曾借阅过台湾出版的《于右任年谱》：“1963 年 4 月 18 日，因喉部不适，被家人送入石牌荣民总医院检查治疗，由于无力支付巨额费用，一再要求出院。……勉从本人意愿，移家休养。”“1964 年 8 月 1 日，病情突然加重，在家中晕倒一次，但仍拒绝住院治疗。”“9 月 10 日又拔二牙及残齿，随即引起发烧。老人颇感头部不适，心绪极其烦躁，便坚决要求出院，天天嚷道：‘太贵了，住不起，我要回家！’”“11 月 10 日已入弥留状态。中午，有关人士寻遗嘱，打开保险柜，仅发现老人亲笔所书债单数张。延至晚 8 时 8 分，不幸逝世，享年八十

有六。”于老 80 岁以后身体仍健旺,85 岁后不过患喉症和牙病,如果坚持住院治疗,不难康复,期颐可期;却过早地与世长辞,真令人百感交集!一方面,他把侨胞汇给他的好几笔巨款统统转给大陆救灾委员会;另一方面,他自己竟然靠借债维持生活,无钱住院治病。把二者联系起来,善良的人们都会心潮起伏,受到强烈的震撼。作为一代伟人,于老无疑是永远屹立于炎黄子孙心灵深处的灯塔;在一切“向钱看”的商品经济时代,尤其如此。

我第一次谒见于老,于老翻阅了我的诗词手抄本,对诗词及毛笔字都热情肯定,使我深受鼓舞,我便请教关于诗词书法的问题。于老说:“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词书法,先哲都视为‘余事’,也就是‘业余工作’。然而‘余事’也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余事”是相对于“本职”而言的,于老在推翻专制、鼓吹民主、创办报纸、振兴教育、反对军阀割据、抵抗日寇侵略等一系列“本职”工作中创造出辉煌业绩,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扩展了辽阔视野,开拓了博大胸怀,造就了一代伟人。以一代伟人而从事诗词书法创作,则其诗词书法创作,便都是一代伟人的经验、视野、胸襟的生动体现,自然不同凡响。当然,诗词书法要能“卓然自立”,还得在“余事”上狠下苦功。仅就书法而言,于老自幼临池,上世纪 30 年代以前以魏碑为基础而参以篆隶,在行楷中开拓新路。从 30 年代起专攻草书,吸取章草、今草、狂草的精髓,参以魏碑的笔意而不断创新,创立“标准草书”。“草书”而要求“标准”,源于经世致用的博大胸怀。于老曾说:“楷书如步行,行书如坐轮船火车,而草书就如同乘坐飞机。”这就是说:写草书效率高,可以节省时间。但草书经历代书家之手,唯求美观,信笔挥洒而略无规范,既难学,也难认,愈变去实用愈远,终难在群众中普及。于老有鉴于此,以“易识”“易写”“准确”“美丽”为原则,从大量的前人草书中筛选出最优美的字而加以系统化整理,缔造出一个崭新的标准化草书体系,使草书兼有实用与审美两种功能。自 1936 年 7 月《标准草书·千字文》集字双钩本出版以来,不仅国人习者日众,日本学人也列为草书范本,影响日益深远。于老又在数十年如一日的创作实践中不断提升他的标准草书艺术,简净明快,雄浑奇崛,深沉朴拙,博大清新,纵横变化,仪态万方,于飞动中见俊逸,于疏放中见规范,愈到晚年愈入化境,外柔而内刚,笔简而神完,落落大方而心平气和,平易近人而情深意厚,在跌宕起伏中表现出动人的节奏感和醉人的神韵美。这便是于老在书法创作方面的“卓然自立”,但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卓然自立”。他在创造并且完善“标准草书”的漫长岁月里,

使我们仿佛看到一个坚忍不拔的灵魂在用书法歌唱，歌唱民族文化，歌唱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歌唱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这一切，当我们观赏《于右任书联集锦》的全部作品时，都会有所体认，有所感悟。

《于右任书联集锦》中的对联，一部分是于老从前人对联中筛选的，另一部分，则是他自己创作的。其共同特点是：气象宏阔，意境崇高，有积极的教育意义，足以提升阅读者的道德品质和精神境界。于老“造福人类”的价值取向和“为万世开太平”的终极关怀，在这里也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于媛女士是于老的侄孙女，她的父亲于隆和母亲张英曾经侍奉过于老夫妇，又为于老的发妻高仲林和女儿于芝秀养老送终，历尽艰辛。如今，于媛女士秉承父母的宏愿，又为弘扬“于学”而出任西安于右任故居纪念馆馆长和陕西于右任书法研究会副会长。于老是有多方面卓越成就和杰出贡献的伟人，从这一意义上说，“于学”的提出是会得到普遍认同的。希望于媛女士以《于右任书联集锦》的编印为起点，多方面开展工作，使“于学”研究开出灿烂之花，结出丰硕之果。

2005年5月4日写于陕西师大博导南楼

缅怀邓宝珊先生

我出生于甘肃天水县西北乡的渭水之湄，即现在琥珀公社的霍家川。大约在我七八岁时，乡亲们常常以亲切的口吻讲到邓宝珊，说他在什么地方又打了胜仗。讲述者既根据传闻，又借助从戏曲、小说中获得的作战知识，尽情渲染，绘声绘色，听起来好不热闹。后来听说邓宝珊就是天水人，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平添了自豪感，也想学打仗，常和小朋友们一起舞刀弄棒的，总想出奇制胜。一旦打输了，就说：“我找邓宝珊去！”

岁月如流，转眼过去将近二十年，我在南京中央大学求学。学打仗的志愿早已被学文学所代替，然而就在这时，我却意外地见到了邓宝珊。

1948年暮春的某一天，我到王新令先生家里去，看见书案上新添了一幅照片，上款写着“新令老弟存念”，下款是“邓宝珊赠”。字用毛笔书写，既雄健，又秀逸。我问道：“这字是谁的代笔？”王先生笑着说：“哪里是代笔！就是邓先生的手笔。你以为邓先生是个光会打仗的武夫吗？错了！他博览群书，广交各界名流，其学问之渊博，见闻之宏富，阅历之深邃，识见之卓越，非一般人所能想像。你是专攻文学的，他在文学艺术方面的造诣之深，也出乎你的意料之外。”王先生这一席话，又唤起了我童年的愿望——“我找邓宝珊去”。

我还没去找邓先生，邓先生却先来找我了。一个晴朗的早晨，我正在中央大学文昌桥宿舍里看书，忽然有人推门而入，问道：“您是霍先生吗？邓宝珊将军派我来接您。”我们坐吉普车到了豆菜桥宾馆，上了二楼，邓先生已在客厅门外等我，这使我感到惊异。后来经过长期接触，才知道虚怀若谷、奖掖后进，原是邓先生的一贯作风。此后，接连几个星期日，邓先生派车接我去聊天，谈论的范围非常广泛。他谈政治、军事、经济方面的问题，我插不上话，他便转而谈历史、哲学、绘画、书法、音乐、雕塑等方面的话题。他谈中国文学时，唐诗宋词中的名篇佳句滔滔不绝，脱口而出；谈外国文学时，对许多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都如数家珍，往往超出我的阅读范围。

有一次，邓先生忽然谈起了谜语，出了许多谜语让我猜。如“万里桥西一草堂”，打一鸟名；“风飘万点正愁人”，打《西厢》一句。我都猜着了，谜底分别是“杜宇”和“落红成阵”。第三个是“无边落木萧萧下”，打一字，相当难猜。南朝宋、齐、梁、陈的四个朝代中，齐和梁的皇帝都姓萧，“萧萧”之下，就是“陈”，“陈（陳）”字“无边”，又落木，就剩下“日”了，所以谜底是“日”字。这个字谜，幼年就听家父讲过，因而也未被考倒。可是打一县名的谜语“作冢像祁连”，却把我考住了。这个谜语的谜底就是霍丘，安徽省的县名。霍去病去世，汉武帝为纪念他长驱西域的赫赫战功，按祁连山的形状为他建造巍峨的陵墓（坟墓，称“冢”，亦称“丘”。《方言》：“冢，自关而东谓之丘。”）。这件事，《史记》未记载，《汉书》里却写得很清楚。我读《史记·霍去病传》较熟，《汉书》则只粗略地看过，忽略了“为冢像祁连山”这句话，因而连我们霍家的典故都弄不清，至今想起，还不禁脸红。

和邓先生多次谈论，使我对邓先生产生了由衷的敬意。我好奇地问邓先生：“您哪来的时间读了这么多书，又读得这样熟？”他谦虚地说：“我并没有正规地读过书……”接下去他讲了一段往事：

“我幼年因为家境贫寒，只读过几天私塾。十多岁时漂泊到新疆，因思念老母，想写封家信都写不了，因此打算再认些字，学会写家信，于是，我便到附近一位老先生那儿去投师。见到老先生后，我向他说明来意，他只是哼哼唧唧，总不说一个行字。他家还有个老大娘，别无劳力。我见水缸已空，便去挑水，挑满了就走，一连挑了十多天，不提投师的事。我的行为感动了老大娘，她对先生说，‘你这个死老头子，人家娃子天天给咱们打老远挑水，你忍心吗？’老先生这才找出一本《秋水轩尺牍》，说：‘来吧，就学这个，认一篇背一篇！’过了半个月，按照老先生的指点，我背熟了十五篇以后，就自己动手，写了第一封家信。”

讲到这里，邓先生感慨地说：“我就是这样踏上自学道路的，你是科班出身，哪晓得这其中的许多苦衷！”

邓先生和我讲到他早年的艰苦经历时，念了几首自己作的诗，其中一首是：“髫龄失怙走天涯，荆花憔悴惨无家。马蹄踏遍天山雪，饥肠饱啖玉门沙。”虽然有“失粘”的毛病，但平仄协调，寓抒情于叙事，真切动人，不失为一首好诗。

邓先生从王新令先生口中得知著名学者汪辟疆老教授热心表彰陇上学

术,对我和刘持生、马驥程等甘肃后学也十分器重,着意栽培,便想拜望汪先生,表示谢意。他先接了王新令先生,然后由我和驥程陪同,接汪先生同游灵谷寺,款以盛宴,畅谈竟日。我和驥程都作了纪游诗。邓先生知道于右任先生为我资助学费,很高兴,和我同去看望于先生。记得他当面为于先生连划三策,其上策是:“辞去监察院长,到上海挂牌卖字。”于先生掀髯沉吟,终于苦笑着说:“你的主意很好,可是,你再想想,这能行得通吗?”

解放后,我一直在西安从事教育工作,住在南郊。邓先生每从北京开会回来,途经西安,总要接我去畅谈,询问工作、学习、生活等方面的情况,对我关怀备至,期望甚殷。

大约是 60 年代初,因为《参考消息》上披露了“于右任先生思念大陆”的消息,我便问他是否知道于先生的近况。他说他在北京开会时,总理对他说:“于先生又有诗了。”接着,便把从总理那儿了解到的两首诗念给我听。一首是七律,我现在只记得两句:“为待雨来频怅望,欲寻诗去一沉吟。”另一首是七绝,题目忘记了,诗是这样的:“独立精神未有伤,天风吹动太平洋。更来太武山头望,雨湿神州见故乡。”诗中流露出来的萧条晚景和浓烈的怀乡恋土之情,使我们深受感染,同时发出深长的叹息。

1964 年暑假,邓先生的哲嗣成城来看我,我正哮喘病发作,不能行动。当时领导上让我离校疗养,成城便邀我到兰州去,说住在“慈爱园”里,环境清幽,医疗也方便。“慈爱园”乃邓先生寓庐所在,当地人称为邓家花园。1940 年 6 月敌机犯兰州,邓夫人崔锦琴女士与其一女两子同时遇难,葬于园中。其时邓先生驻守榆林。1941 年于右任先生西巡,吊其墓,并大书“慈爱园”三字,榜于园门,作诗记其事:“百感茫茫不可宣,金城到后更凄然。亲题慈爱园中额,莫唱鳬雉榜母眠。”自注云:“宝珊长女倩子最后窗课,录写杜诗‘渗径杨花铺白毡,点溪荷叶叠青钱。笋根稚子无人见,沙上鳬雉榜母眠’,翌日与其母及两弟避敌机同罹难,皆葬园中。”日寇投降,邓先生始回兰州展墓,同里冯国瑞先生为作《慈爱园曲》以抒其哀,我至今犹能背诵,常以未能亲至其园为憾。成城邀我去园中养病,便欣然同意。成城回去不久,邓先生就发电报催我动身,我便坐火车到了兰州。一下火车,邓伯母、成城老弟和王新令先生的夫人都迎上来,扶我上了汽车。车开进慈爱园时,邓先生也拄着手杖,走出客厅迎接我。此情此景,不仅当时我被感动得流下热泪,多年来每一忆及,心情也无法平静。

在慈爱园中住了一个多月,与邓先生朝夕相处,谈论甚欢。那时候,邓先